

连线

上海更多

千沟万壑看巨变

——“三北工程”修复黄土高原生态纪实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夏末,西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间,一丛丛绿树青翠欲滴。这里是宁夏彭阳县城阳乡陈家沟村的林场。宁夏彭阳气候干旱,这里曾经植被稀少,黄沙漫漫。如今,彭阳处处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26.2%,一跃成为全国著名的生态示范县。

彭阳是我国实施“三北工程”修复黄土高原生态的一个范例。30年来,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省区协力同心,造林779.1万公顷,使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9.55%,森林生态系统得到初步恢复。



宁夏彭阳县麻喇湾流域一度水土流失严重,是该县重点水土保持区。“三北工程”实施后,当地干部群众在麻喇湾流域开展了以造林种草为主的水土保持工作,坚持山、水、田、林、路、草综合治理,生态治理效果日益凸显。图为彭阳县麻喇湾流域治理后的美丽景象。

沙尘暴频繁,危害严重。由于干旱少雨、超载过牧,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加剧,草地退化、沙化和盐化面积逐年增加。青海黄土高原地区有荒漠化土地2100多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40%以上,且以每年145万亩的速度扩展,草地退化、沙化和盐化面积一度逐年增加。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另一表现是水土流失,年均输入黄河泥沙曾达16亿吨,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环境日益恶化,使黄土高原生态系统功能衰减,耕地资源减少,土地生产力降低,自然灾害频发。大量入黄泥沙增加了黄河防洪安全难度,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约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让黄土高原重现绿色,成为人们的共同期盼。

壮举——

建绿色万里长城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说,让黄土高原变绿,让黄河水变清,让黄沙后退,是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三大目标”。自1979年起,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三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治黄工程”。

“三北工程”就是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形成带、片、网相结合的“绿色万里长城”,从根本上改善域内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黄土高原生态修复是“三北工程”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具体措施则是植树造林、发展林果、涵养水土。

国家林业局三北局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三北工程”在黄土高原完成造林779.1万公顷,加之其他生态工程的植树造林,使黄土高原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11%提高到目前的19.55%,建成了区域性防护林体系骨架,森林生态系统得到初步恢复。山西省“三北工程”黄土高原区造林15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27.8%;甘肃省“三北工程”黄土高原地区完成造林24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18.6%;陕西省“三北工程”黄土高原区29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32.74%;宁夏黄土高原地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1.1%提高到现在的9.84%,生态状况已经明显好转……

“三北工程”不为单纯造林而造林,栽致富树、发展特色林果成为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在黄土高原地区造林近800万亩,农民人均0.5亩,果品年总产133.5万吨,产值25.2亿元。陕西省经济林面积已达135.6万公顷,年产各类干鲜果品1000多万吨,产值超过100亿元。山西省临汾市干鲜果品由1978年前的11.91万亩发展到84.88万亩,果品产量达16335万公斤,果品收入48160.4万元。

目前,在晋陕沿黄地区及甘肃陇东、宁夏等地,大力发展起来的红枣、花椒、核桃、枸杞等生态经济兼优树种,已经撑起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区域辐射带动力、商业品牌响的名特色优新干鲜果品基地。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是一场攻坚战。“三北工程”坚持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封山育林,禁牧育草,按山系、分流域综合治理。山西省通过“三北工程”建设,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0万公顷;甘肃省“三北工程”造林涵养水源面积5.77万公顷,保持水土面积12.75万公顷,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05.36万公顷。30多年来,“三北工程”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万平方公里,使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23万多平方公里,土壤侵蚀模数大幅度下降,年入黄泥沙减少4亿吨左右,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

目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和侵蚀强度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下游河床淤积抬高实现减速,为黄河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成就——

古老荒原现生机

“三北工程”给黄土高坡染上层层绿意,古老的荒原重获新生。

8月末的内蒙古乌审旗,绿意盎然。全旗森林总面积达550多万亩,形成了以人造板、饲料加工和生态旅游、生物质发电为主的林业产业体系,农牧民来自林业的人均纯收入达1700元,走出了一条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地方增税的治黄兴绿之路。

植树造林、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乌审旗等黄土高原地区传统耕作方式和畜牧模式开始转变,奠定了绿色增长的物质基础。长期以粮食为主体的种植业向粮经结合的种植结构转变,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肥力;畜牧业生产方式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模式转变,为黄土高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绿色资源。

绿色前进,黄色退却,为黄土高原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山西省临汾、吕梁、陕西榆林、延安,甘肃陇东,宁夏宁东,青海海东,都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基地,成长为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引擎。甘肃省庆阳市通过植树造林,形成了带、片、网结合的庞大防护林体系,使全市434.9万亩的耕地受到林网庇护,仅此一项,全市年增产粮食1570万公斤。陕西省韩城市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把发展花椒作为全市的支柱产业,花椒经济林总面积已达3万公顷,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花椒商品生产基地,花椒总产1.6万吨,收入3.75亿元,占到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

昔日黄沙漫天的黄土高原,如今绿意日益浓郁,建设美好家园的夙愿正逐步变成现实!

夙愿——

让黄土高原返绿

走进黄土高原,天还是那片天,但地已不再是那片地。看着千沟万壑间的丛丛绿树,初来的人们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曾经风沙漫天,黄土裸露。

黄土高原东起太行,西至青海,南接秦岭,北抵塞外,涉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内蒙古7省区,总面积64.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6.76%。由于气候变迁、过度开发,黄土高原一度植被破坏严重,一到下雨,黄土就流成滚滚泥汤,冲进黄河,淤塞河道,抬高河床。天长日久,黄河成了世界著名的地上悬河,洪水泛滥频繁。

荒漠化、沙漠化是肆虐黄土高原的第一大灾害。调查数据显示,仅宁夏就有荒漠化面积4461.0万亩,其中沙化土地面积1774.5万亩。内蒙古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和杭锦旗,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降雨稀少,蒸发量大,



发展特色林果是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田园移民新村农民正在“生态移民有机枸杞出口基地”的林间除草。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33岁的夏剑峰原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上班,见父母种地辛苦,就回家当了农民。他先在10多亩承包地里种花卉,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2013年,他种了20亩草莓、10亩西瓜和40亩水稻,收入达到近50万元。今年总收入预计达70余万元。

夏剑峰是上海市郊金山区最年轻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有夏剑峰这样的粮食家庭农场2303个,粮食种植面积28.66万亩,比去年底分别增长21.7%和25.8%。在培育和发展夏剑峰这样的粮食家庭农场过程中,上海总结出4个主要特征:“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都市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据上海市农委介绍,当地鼓励在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条件下发展家庭农场,即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退出粮食生产领域,由家庭农场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合作社着力在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方面更进一步,着力在创立品牌、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方面更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经营的综合效益。

上海还出台了《关于本市加快推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家庭农场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涉及土地流转、登记建档、财政、工商税费、金融保险电力、人才培育、社会化服务等7项扶持发展家庭农场的政策措施。

上海市财政已安排专项奖补资金,对土地出租期限较长的流出农户和引导培育家庭农场发展的村委会实行考核奖励,为发展家庭农场创造条件。今年6月1日起,市、区县两级财政部门设立担保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区县家庭农场贷款担保,银保联合项下家庭农场贷款担保金额可达50万元。

根据规划,至2017年,上海市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将达77.68万亩,占水稻种植最低保有量面积的58.1%。

甘肃静宁:

向农业园区要效益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的《静宁县葫芦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日前通过专家评审。

甘肃省静宁县将以苹果产业创新升级为突破口,推进依托农业产业化带动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四化同步”的“静宁模式”,把葫芦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成为全国优质苹果产业化创新示范基地、华夏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和现代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示范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样板。

据了解,静宁县2003年已经被农业部列入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2013年苹果面积达91万亩,今年将达到100万亩,是全国县级苹果面积最大产区。除苹果以外,静宁县小麦、玉米、谷子、荞麦、莜麦、高粱等粮食作物产量也不断上升,油料、花卉、蔬菜等种植业及肉牛、肉羊等养殖业逐渐兴起,农业多元化发展已初具基础。

今后,静宁现代农业示范园将充分发挥苹果产业专业化优势,适度配合发展其他种植、养殖产业,与苹果产业一同构成相互有机结合的产业系统,增强农业体系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广西横县茉莉花飘香



广西横县茉莉花种植面积10万亩,花农30多万人,享有“中国茉莉花之乡”的盛誉。横县年产鲜花8万吨,茉莉鲜花年销售收入达8亿元;花茶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花茶6万吨,产值20多亿元,每年出口东盟、欧美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茉莉花茶产值达6亿元。图为广西横县校椅镇六凤村村民在采摘茉莉花。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本版编辑 刘佳

以改革思路化解乡镇债务

瞿长福

不久前去苏南地区采访,一位乡领导告诉记者,乡里现在一大任务是还债。由于乡政府欠债多,乡干部都在抓紧谈引进项目,期待项目成功后能够减轻一些债务。不过,这位领导对债务并不特别着急,因为他在任上欠债并不多,况且欠债的乡镇并非少数。“说不定哪天我就调走了,你说呢!”他的语气很平静。

这个乡镇的债务情况,可以说反映了目前乡镇债务的普遍现象。一是大规模负债,近日媒体披露的国家审计署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二是负债使许多乡镇成了“还债财政”、“吃饭财政”,这种情况各地都有,中西部地区尤甚;三是如果不加以遏制,欠债会更加突出,因为乡镇干部是流动的,这导致许多人不怕欠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记者就参加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乡村债务调查。那时候由于农村“三提五统”,农业税及各种税费存在,加上村村点火冒烟办乡镇企

业等,大多数行政村都欠下了一屁股债。本世纪前10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及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行,村级债务得以缓解,但乡镇债务乃至县市债务等却逐年增加。

分析起来,乡镇债务可以分为“旧债”与“新债”。旧债除了少量当年垫付的税费积压和兴办企业留下的烂账,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乡镇公益事业欠账,比如修建公路、水利、电力等各种“村村通”时要求乡镇配套的部分,“普九”义务教育兴建中小学校的开支以及各种达标欠账等,还有部分是各种行政开销乃至办公大楼等“形象工程”开销。

新债一部分是为了偿还上述欠款,另外一部分与这些年为完成GDP考核和财政收入增长而搭建的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有关。许多乡镇因兴办各种园区、商业区不当,或者直接投资办企业失利而举债,还有部分是各种评比达标垫支,以及因项目配套而欠下新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乡镇债务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被迫举债,与乡镇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有关。按照现有行政管理机制,乡镇政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财权很小,事权很多,所有部门及行业的检查、考核与达标都要落实到乡镇一级。这里面许多都与项目落实有关,每个项目都要求地方配套资金,有财力的乡镇还好办,多数乡镇只能举债落实,小马拉大车。有个乡镇领导说,年初省里有个生态项目很好,但要求资金配套,专款专用,他们最后放弃了。

乡镇债务的另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不当举债,主要因为政府这只手“装错了地方”造成烂账,此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急于赶超地区更为明显。记者采访过中部地区一乡镇,在县里招商引资政策鼓励下,计划圈建一个汽车零部件城,需要占地拆迁、修路通电、引资盖房等等,但由于规划脱离实际,地圈了,房建了,配件商们却不愿来,镇里由此欠下了一大笔账。这些

年许多乡镇债务就是因政府直接投资竞争领域、直接规划市场业态而形成的。

所以,化解乡镇债务,除了近些年正在逐渐加强的审计监督、严控建设规模等举措外,根本还在于深化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乡镇政府主要职能与职责是什么?它有没有能力、能不能直接去办企业、建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需要真正厘清,并确定政府这只手的边界。否则,“因公举债、因债举债”的冲动和行动将永无止境。同时,要建立与乡镇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制度,乡镇作为基层政府,需要在制度上确立相应的财权,不能总是“先做了再说”。即使是公益事业,也要尽量减少所谓乡镇配套,不能总是负担转移,要让乡镇有条件从制度上转型到服务型政府上来。

三农时评